

◀ (上接6版)

也就罢了;令人意外的是,主持妙峰山进香调查的顾颉刚,也不提张竞生。1922年1月北大文科研究所国学门正式成立,除了培养研究生,编印书刊,还设有考古学研究室、明清史料整理会、风俗调查会、歌谣研究室、方言调查会等。1926年8月18日刊行的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》第二卷24期上,提及下属各单位业绩,风俗调查会除了发放表格,请暑假回乡学生以及各地学校代为调查,再就是“由本会自行派员调查者,计有妙峰山东岳庙、白云观及财神殿进香之风俗”。查1923年5月19日、1923年11月10日、1924年3月6日、1924年6月12日《北京大学日刊》上的《研究所国学门启事》、《研究所国学门悬亲会记事》(魏建功)、《张竞生启事》、《研究所国学门风俗调查会开会纪事》等(参见王学珍、郭建荣主编《北京大学史料》第二卷第1484—1496页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0年),证实风俗调查会确系张竞生发起成立的。可惜的是,现代学术史上颇为显赫的妙峰山调查,竟与张竞生无缘。1925年4月30日至5月2日,顾颉刚与容庚、容肇祖、庄严、孙伏园等上妙峰山,调查香会的组织、礼仪以及民众心理等,此乃北大提倡民俗研究后开展的第一次正式调查,领到了调查费用五十元。在4月30日的日记中,顾颉刚称:“到妙峰山看烧香,想了好几年,今日乃得实现。”为何如此期待?原因是:“在研究学问上着想,我们应当知道民众的生活状况”;“学问的材料,只要是一件事物,没有不可用的,绝对没有雅俗、贵贱、贤愚、善恶、美丑、净染等等的界限。”(顾颉刚:《妙峰山进香专号·引言》,1925年5月13日《京报副刊》第147《妙峰山进香专号》)查顾颉刚1925年日记,后面附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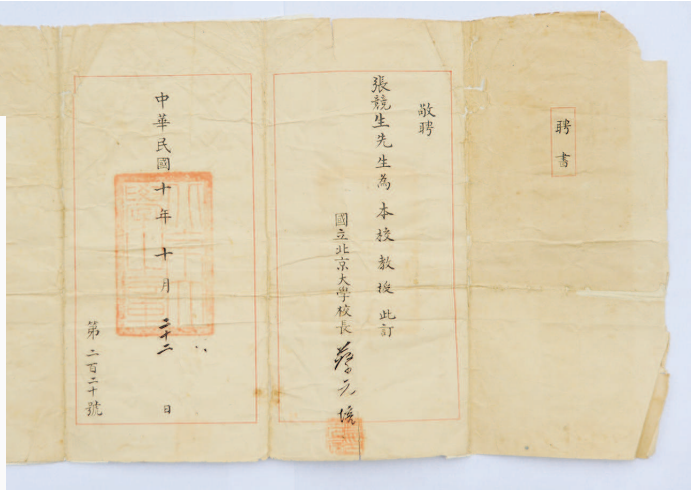
师友联系方式(地址或电话),共约130人,可就是没有风俗调查会首创者张竞生。

在《〈国学门周刊〉一九二六年始刊词》中,顾颉刚提及参观北大二十七周年纪念会陈列室的人,“到考古室时很感到鼎彝的名贵,到明清史料室时也很感到圣谕的尊严,但到了风俗和歌谣室时便不然了,很多人表示轻蔑的态度”,这点让他很愤慨:“在我们的眼光里,只见到各个的古物、史料、风俗物品和歌谣都是一件东西,这些东西都有它的来源,都有它的经历,都有它的生存的寿命”,因而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。这还不算,又添了一句“固然,在风俗物品和歌谣中有许多是荒谬的、秽褻的、残忍的”。经由新文化人的积极鼓吹与提倡,猥亵的民间歌谣以及卑微的风俗物品,作为文学或史学的辅助材料,很快就登堂入室了。唯独不能接受的,是张竞生主持的关于性史的调查。

据张竞生回忆:“我当时是‘北大风俗调查会’主任委员。在调查表中由我编出了三十多项应该调查的事件,其中有性史的一项。会员们(都是教授)在讨论之下,觉得性史的调查,恐怕生出许多误会,遂表决另出专项。所以我就在北京报上发出征求的广告了,这个可见性问题在我们当时看来,也是风俗的一门,应该公开研究的。”(张竞生著、张培忠辑:《浮生漫谈——张竞生随笔选》第154页,北京:三联书店,2008年;另见江中孝编《张竞生文集》下卷103—104页)这个刊1926年初《京报副刊》的征求性经验的启事,含九项内容,从几岁春情发生,到手淫、梦遗、同性恋,再到口交、嫖妓、性好、性量、性趣等,“请代为详细写出来”:“尚望作者把自己的‘性史’写得有色彩,有光芒,有诗家的滋味,有小说一样的兴趣与传奇一般的动人。”(张竞生:《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遣法——



◀ 张竞生留影



▲ 张竞生北大任教聘书

代“优种社”同人启事》,1926年2月2日《京报副刊》第403号)1926年5月,张竞生编纂的《性史》横空出世,虽然张本人的《序》及《赘语》努力学理化,但七个案例细致入微,文采飞扬,成了主要看点。一时间,民众争相抢购,不法书商伪造续书,道德之士纷纷谴责,而“张竞生忙碌半年,分文未取,却被一世恶名,而且人生道路从此发生逆转,以至蹉跎终生,每每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”(参见张培忠《文妖与先知——张竞生传》第348—361页,北京:三联书店,2008年)。

众多谴责与迫害,最让张竞生铭心刻骨的,是原北大总务长、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、日后长期执掌北京大学的蒋梦麟。在《浮生漫谈》和《十年情场》二书中,张竞生对蒋梦麟如何刻意迫害他,有绘声绘色的描写。蒋梦麟抗战中陆续写成的英文自传《西潮》,以及提到很多北大文科教授的《谈中国新文艺运动》,都只字未提杭州拘捕张竞生事。不过,在《西潮》第十九章“反军阀运动”中,蒋曾反省在杭一年工作:“我当时年壮气盛,有所决策,必贯彻到底,不肯通融,在我自以为励精图治,在人则等于一意孤行。”若坚信张竞生败坏社会风气,有损北大声誉,时任浙江省教育厅长的蒋梦麟,是有可能出手的。至于具体细节,在相关档案发布之前,只能先听张竞生的一面之词。

在我看来,与周作人、周建人、潘光旦等一大批新文化人的论战,对于张竞生来说,是很不明智的,甚至可以说是灾难性的。半个多世纪后,另

一位性学专家刘达临谈及《性史》风波:“张竞生经受了两者打击,一是传统的保守势力,一是借性学之名行淫秽之实的书商,而后的打击是致命的”;“他太激进,太孤军深入,如果多一些灵活性,多一些藏拙和含蓄,也许能少经受一些打击,多实现一些理想。可是,人们又怎能以此苛求一个奋不顾身的勇士呢!”(刘达临:《20世纪中国性文化》第158页,上海:三联书店,2000年)后一句很有见识,前一句则不太准确,真正给与张竞生致命打击的,不是“传统的保守势力”,而是同样关注妇女问题及性道德的新文化人。因他们特别担心,这位完全不顾中国国情的张竞生,将这个好题目给彻底糟蹋了,自己成烈士不说,还连累此话题也成了禁区。这就好像一头莽撞的大象,出于好奇,闯进了瓷器店,悠然转身离去时,留下了无法收拾的一地碎片。

这就回到,为何同是关注民众日常生活,顾颉刚的妙峰山调查大获好评,而张竞生的性史调查却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?除了世人误解以及环境压迫,还得谈谈张竞生自身的气质与才情。

作为留学法国的哲学博士,张竞生是有一定的专门学养的。只是因其好出惊人之论,当年北大同事,普遍对他印象不佳。单看他为青年开书单,你就明白这个人何等自恋与狂傲。1925年《京报副刊》征求青年必读书十部,第一个登台亮相的是如日中天的胡适,同年2月27日的《京报副刊》上,刊登第十五位名流学者北大教授张竞生所开书目:(1)《建国方略》(孙中山著)、(2)《红楼梦》、(3)《桃花扇》、(4)《美的人生

观》(张竞生著)(夸口夸口,玩笑玩笑!),以下六书为译本,能读原文更好:(5)《科学大纲》(英丹森著)、(6)《创化论》(法柏格森著)、(7)《结婚的爱》(斯妥布士著)、(8)《相对论浅说》(爱斯坦著)、(9)《社会问题详解》(共学社出版)、(10)《互助论》(克鲁泡特金著)。在众多中外名著中,非要插入自己刚出的小书不可,虽加了一个括号——“(夸口夸口,玩笑玩笑!)”,还是让人感觉很不舒服。细读前后文,这可不是自嘲或幽默,显然,北大时期的张竞生是很自负的。

在一个崇尚中庸的国度,意气风发,标新立异,既是巨大的诱惑,也是致命的陷阱。以“奇谈怪论”暴得大名,其实不祥。当然,不排除张竞生有意为之,故作惊人语,挑战公众神经。在《卢骚忏悔录》第三版序言中,张竞生称:“做好人已难,做有革命性之人更难。你想他若是庸庸碌碌,当然不能得盛名。他的得名乃在他的特见伟论,这个当然不免于惊世骇俗,而引起一班仇人反对了。……凡大思想家,类多受诋于当时,而获直于后世者。”这段话虽是开列书目三年后才写的,但张竞生的思维方式及发言姿态,我以为早就设定了。要得“盛名”,就得有“特见伟论”,就得敢于挑战权威以及世俗偏见,即便当时备受诋毁,后世也可收获盛誉。某种意义上,这也是一种立言乃至扬名的策略。

北大时期,说说大话是没有什么关系的。1926年的负气出走,此后是另一番天地。因《性史》事件饱受非议,留在北大也会不愉快,但相对来说,大学还

(下转8版) ▶



张竞生《美的人生观》(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0)。《美的人生观》1924年5月印成讲义,1925至1927年间重印7次(参见江中孝编《张竞生文集》上卷第23页,广州出版社,1998年)。